

永州与柳宗元的辞赋创作

李 小 华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48)

[摘 要] 柳宗元的辞赋作品,大多作于贬谪地湖南永州。永州富有地域特色的自然景观及富含悲怨意蕴的文化传统,带给柳宗元崭新的视觉上的和精神上的体验,从而生发了柳宗元的辞赋创作。永州的山水风物生动地展现在柳宗元的笔下;以屈原及其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浸润着柳宗元的创作;永州的民风民俗为其创作提供直接的素材。在异域文化的熏陶下,柳宗元的辞赋创作别开生面。

[关键词] 永州; 柳宗元; 地域文化; 辞赋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1-0079-04

柳宗元共有33篇辞赋作品,除去为京官时所作3篇律赋和作于赴永途中的《吊屈原文》之外,其余29篇均作于贬所湖南永州。永州,在湖南省的版图中属于湘南,是多民族聚居地,汉族、侗族、苗族、瑶族等成插花式分布。南楚一带富有地域特色的山水风物和富含悲怨意蕴的文化传统以及迥异于北方的民风习俗,对柳宗元的辞赋创作具有重要的生发作用。“不同的文化特征在地理上的分布,构成了形式文化区之间的异量之美。文化之异量之别,一般表现在地理环境、语言风俗、宗教信仰、精神特征、制度文化、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这种差异最初往往植根于地理环境为基础的物质文化方面,继而延伸到非物质文化的诸多领域”^[1]。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受典型中原文化熏陶的柳宗元对于永州的楚文化有一个接受认同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比较艰难。其结果就是柳宗元能够把浪漫主义的楚文化与现实主义的中原文化相结合而写出具有时代个性的作品。

本文拟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柳宗元的辞赋创作。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地域的自然景观传达给作者的信息,以及作者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审美或者其它方面的情志;二是地域的人文景观,包含民风民俗、方言土语、学术文化传统等沉淀于作品中的文化内涵。一个作家,若长期生活于一个特定的区域,自觉不自觉的会把对该地域文化的体验、感受和领悟潜存心中。当他创作作品时,他的主体意识就自然而然地锁定在特定地域文化的根基上,把特定地域的文化结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信仰习惯、价值观念等灌注其中并恰切地展示出来,从而影响作品的内容和风格。

一 永州的自然环境与柳宗元的辞赋创作

《文心雕龙·物色》篇提到“情以物迁,辞以情发”^[2],说

明了外界景物对于创作的关系。在诗人的眼中,一切的外界景物都是文学创造的材料。这些景物一旦与作者的心境、阅历相结合,便会成为一种诱因,激发或者在无形中影响着作家的创作。

永州地处南荒,远离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永州多谪吏”^①《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柳宗元集》^[3]卷23),是唐代流人、谪吏的聚居地。但是南方风物与北方有着显著的差别,“永州治所零陵,地处现代自然地理学所谓零陵盆地南端,南岭山脉的北麓。湘江一派急流,自西南奔腾而来,到零陵城北与东来的潇水汇合北流。这儿的山岩由于风雨剥蚀,形成了一片奇岩怪石。在这样的风景上,点缀以竹树葱茏,碧潭清溪,呈现出一片秀丽不凡的南国风光”^[4]。而这迥异于北方的南国风光也带给柳宗元心灵的震撼,也曾引起他的兴奋。在贬谪的日子里,他游历了永州的山水名胜。永州的山水是美的,他在游记中曾经这样盛赞道“北之晋,西适幽,东及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游黄溪记》,《柳宗元集》卷29)但是,“僇人”的身份使他内心有无法消解的痛苦。或者说,柳宗元本身的心性气质使得他无法心平气和地给予永州山水以审美观照。他骨子里没有同时代的白居易、刘禹锡那种旷达情怀。所以他笔下的永州山水又有另一种面孔“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虫,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痍。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居园土,一遇和景出,负墙搔摩,伸展肢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寄许京兆孟容书》,《柳宗元集》卷30)他一方面对这里迥异于中原的自然风光有新奇感,但另一方面,谪人、流囚的身

[收稿日期] 2010-11-21

[作者简介] 李小华(1982-),女,山东临朐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份让他感到压抑、痛苦和孤独。《闵生赋》写到“肆余目于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波淫溢以不返兮,苍梧郁其蜚云。重华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伪真。屈子之悵微兮,抗危辞以赴渊。古固有此极愤兮,矧吾生之藐艰。列往则以考己兮,指斗极以自陈。登高岩而企踵兮,瞻故邦之殷辚。山水浩以蔽亏兮,路蓊勃以扬氛。空庐颓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榛。块穷老以沦放兮,匪魑魅吾谁邻?”永州的山山水水不仅荫蔽着柳宗元的生活,而且成为他与故园睽隔的最大障碍。柳宗元通过艺术加工夸大了这种地理条件的限制,深刻表现了自己的贬谪之苦。在《囚山赋》中,他直称永州群山为牢笼:“楚越之郊环万山兮,势腾踊夫波涛。纷对回合仰伏以离迥兮,若重墉之相褒。争生角逐上轶旁出兮,下坼裂而为壕。……匪兕吾为桎兮,积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圣日以理兮,贤日以进,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孤独、恐惧、无望的滴臣处境让柳宗元对囚禁他的这片山水充满了复杂之情。

柳宗元的辞赋渗透着浓重的贬谪生活体验和执着郁结的情怀,这种体验和情怀与永州富有南方特色的风物结合,就孕生出幽怨深雅的创作风格。他的辞赋作品因为融合地域特色与个人的经历、情感而充满独特的艺术魅力。

二 永州的人文环境与柳宗元的辞赋创作

(一) 以屈原及其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对柳宗元辞赋(骚体赋)创作的影响

湖南永州,是楚国故地;湘江岸边,柳宗元驻足的地方,屈原也曾流连。“在屈原思想的契合中,地域充当了一个有重要意味的角色”^[5]。历史让柳宗元不得不面对屈原、面对与屈原那个时代相似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而精神气质、个人遭遇、理想追求方面的相似性又让柳宗元与屈原在精神上遥相呼应。屈原的楚辞是楚文化生发下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屈原和楚辞本身就已经成了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屈原精神、楚辞传统及现实的人文环境共同作用下,生发了柳宗元的文学创作,其中最显著的是辞赋中的悲愤哀怨情怀。在唐代,南贬的文人官吏很多,甚至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南贬群体。以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的“八司马”为例,他们在政治追求、人生遭际等方面与柳宗元基本一致,但是深得骚学的却只有柳宗元一人。马积高先生认为“柳宗元在文学(包括赋)上的特出成就就是由于他在被贬谪以前就已初步形成了进步的政治观点、哲学思想和文学见解,在贬谪期间又通过研究深化了这些进步的思想观点。”^[6]而这些正是形成作家、文学作品独特个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相似的政治命运与人生遭际,使得柳宗元在精神上很容易与屈原相通。在群雄纷争的战国后期,屈原主张改革,追求美政理想,却遭到馋毁,由受重用到被疏远进而放逐南夷。柳宗元在强藩跋扈、宦官弄权、积弊成疾的中唐,“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7]《寄许京兆孟容书》,《柳宗元集》卷30),积极参与革新派的政治改革。但永贞革新以失败告终,柳宗元也遭受排斥和贬谪,待罪南荒长达十年之久。自古以来,贤人失志基本上形成了固定的人生模式,是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归隐之路,还是坚持自己

的操守与理想,虽失势却不失志。相比前者,后者是一条艰难的、没有归属的道路。屈原与柳宗元就是选择后者,唯一不同的是柳宗元在这条不归路上最终找准了方向,而屈原精神的罗盘却失灵了。

屈原把满腔的愤懑之情与南国浪漫的巫神之风相结合,创作了哀怨缠绵的骚体辞赋,在华丽的文辞中寄寓了其九死而未悔的斗争精神和崇高的人格美。这种精神泽被后世,“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7]到柳宗元这里,同样焕发了无限生机。面对巨大的政治挫折,他不动摇,不退缩,“虽万受摒弃,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饯药久寿书》,《柳宗元集》卷32)。在贬逐南荒身心备受摧残的痛苦日子里,他愤怒、失望、伤心,迷茫过,消沉过,但他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而屈原正是他精神的楷模与支柱。

柳宗元在赴永途中溯湘水而上时写下《吊屈原文》,这篇文章亦是唐代第一篇屈原的吊文。作者高度赞美了屈原在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现实面前“惟道是就”的大义和不与世同流合污的高洁品质,并表明了自己的志向。“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犹仿佛其文章。托遗编而叹喟兮,涣余涕之盈眶”,与屈原精神上的相投,使柳宗元也折服于他的文学作品。在永州时期,他通过创作具有屈原精神的作品来反映自己的身世遭遇和思想感情,其中以骚体赋为代表。在这类作品中,柳宗元或直抒胸臆,或借景抒情、借物言志,淋漓尽致地抒写了自己贬谪期间的心理活动和人生感受。他不局限于对自己悲惨命运的慨叹,更重要的是抒发了自己对“大中之道”的追求、“以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的政治理念和以“生人为念”的济世情怀。《柳宗元集》卷十八有“骚”10篇,命名的原由就是这些作品在创作中对《离骚》比兴、托喻手法的运用。

在柳宗元的辞赋中,抒情主人公和作者是一体的。刘斯翰在《汉赋——唯美主义之潮》^[8]中提出了辞赋作家“实践的主体人格”这样一个论题。他认为,《离骚》中主体人格所表现出的全部复杂、痛苦的内心世界,来自现实中屈原和楚国黑暗政治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悲剧性冲突,所以他的主体人格就具有“实践性”。而汉代骚体赋却非如此,如贾谊在《吊屈原赋》和《鵩鸟赋》中显得有理智,颇能以理节情,但现实中的贾谊留给后人的却是多愁善感的形象,这种现实人格和主体人格的分裂,导致“非实践”的主体人格的产生,于是刻意的模仿便取代了真情实感,导致汉代的骚体赋被斥为“巧而少信”之作。此后,骚体赋走入创作的低潮期。而柳宗元的辞赋却上接屈骚,体现了这种“实践性”的主体人格。屈原的作品由于楚国巫觋文化的背景,主体人格具有半人半神的特性,而柳宗元的骚体赋运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真切的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写作。柳宗元的骚体赋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在骚体沉寂百年之后又使这一文体重新焕发光彩的主要原因也就在于此。他继承的不只是楚辞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其人文精神。

柳宗元的辞赋取法屈原辞赋,而又别开生面。屈赋运用浪漫主义的写作方法,吸收楚地大量神话素材,在楚地风物

人情的基础上,展开优美新奇而又夸张自由的想象,表达的感情是哀怨而奔放的。在写作手法上,屈赋采用铺陈比兴、回旋往复的表述方法,带有先秦诗歌一种共有的艺术特色。柳宗元的《答问》、《起废答》等问答体,明显地借鉴屈原《渔父》篇的章法。而柳宗元的骚体赋作品,没有模拟沿袭《离骚》等的一连串神话和虚构故事所组成的象征比兴体系。他用凝重而又简洁的语言直抒胸臆,句句写实;他没有屈赋梦幻般的描绘方法和精神上上天入地无所不往的遨游,而是无论在描绘方法还是思想上都表现出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即使在《梦归赋》这样虚幻色彩较浓厚的作品中,现实性也很强。他以“文”命名的新文赋,如《乞巧文》、《骂尸虫文》、《宥蝮蛇文》、《哀溺文》等,则是通过咏物、叙事来言情写志。在这类咏物作品中,在借鉴先秦寓言的表现手法的基础上,整篇比兴讽喻,着力于塑造完整而独立且有所寄托的寓言形象,借以歌颂社会的美好和抨击社会的黑暗。这种寄寓法脱胎于屈赋中的“比兴”传统,而又具有唐代古文运动影响下的时代特色。

(二) 永州的民风民俗对柳宗元辞赋创作的影响

“文学与民俗的关系,通常表现为文学作品中对社会和人物的描写离不开对当时社会民俗的描写。这些描写往往收到塑造的人物形象真实、生动、感人,使作品富于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的效果。而从文学作品的描写中,也可以看到当时的民俗情况”^[9]。在柳宗元的辞赋中,我们可以看到永州的民风民俗对其创作的激发作用,而透过其作品,我们又可以了解到当时永州的风土人情、民间习俗。

永州是多民族聚居地,民俗民风具有多样性。夹杂着异域民族风味的民风民俗给柳宗元在永州的生活带来了不少新鲜感,并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对于所见所闻,柳宗元往往加以生发,联系现实,借以宣泄自己的感情。《柳宗元集》中“骚”卷的10篇文章基本都是在永州风土人情的影响下创作的。《乞巧文》以女隶七夕乞巧的故事引发其对于性格“巧”的祈求。七夕“乞巧”一俗源于长江流域,《太平御览》、《荆楚岁时记》、《西京杂记》、《玉烛宝典》等均有记载。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4即有唐宫廷乞巧盛况的描写,但当时主要流行于宫廷。从《乞巧文》中可看到,柳宗元对“乞巧”这一习俗还是很陌生的。对于女隶的行为,他“怪而问焉”,在女隶的解说下方知这一风俗,借此展开的是对社会上各种“巧”行的批判,名为“乞巧”实为“憎巧”、“恨巧”。此后,宋代的孙樵、梅尧臣、杨维桢、王达、郑珍等人皆有模拟之作。柳宗元的《牛赋》高度赞美了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耕牛,而耕牛对于耕种之难的永州之民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湖南,牛是农家之宝,“汉族认为农历十月初一为牛王生日,土家族传说四月十八日为牛王菩萨生日,苗、侗族则多以四月八日为牛神节。每到这一天,为感谢耕牛为人类作出的贡献,家家户户都要清扫牛栏,让牛免耕休息,饲以最好的草料和特质的黑糯米饭或糯米糍粑,还将两个糍粑挂在牛角上,把牛牵到水边映照,或浴牛,替牛王祝寿。”^[10]

《斩曲几文》中的“曲几”亦是永州地区的常用器物,这也是楚地风俗习惯之一。“楚人对房屋求高广,而室内摆设

却低矮。楚墓出土的几、案均为矮腿,是依楚人席地而坐的习惯所设计而成的。楚人席地而坐,但不席地而卧”^[11]。与之相适应的就是制造业的发达,工匠的精湛技艺,在汉代就已经名声远扬,如汉代邹容《几赋》有“眇者督直,聒者磨砢,齐贡金斧,楚入名工,乃成斯几”^[12]的描写。永州地区的这种矮几让柳宗元难以适应,因而引发了他的厌恶之情,作《斩曲几文》。永州产毒蛇,柳宗元在另一篇文章《捕蛇者说》中这样描写“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啖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御大风、挛腕、痿、疔,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柳宗元对于永州的蝮蛇是又恨又怕的,在《闵生赋》中他这样写道:“余因楚、越之交极兮,邈离绝乎中原。壤污潦以坟洳兮,兼蒸沸热而恒昏。戏鳧鹤乎中庭兮,兼葭生于堂筵。雄虺蓄形于木杪兮,短狐伺景于深渊。仰矜危而俯栗兮,弭日夜之拳拳。虑吾生之莫保兮,忝代德之元醪。”《宥蝮蛇文》即由仆人捉蝮蛇一事延宕开来,批判了甚于蝮蛇之毒的一类人。永州多山,多茂林,亦是猴类们的天堂。柳宗元久处山中,对于猴类们的习性、活动比较了解,因而《憎王孙文》中对山间两种猿的描写惟妙惟肖。《诉螭文》是对零陵城西江水中怪兽伤人的控诉。永州气候炎热、干燥,古时南方多竹木建筑,容易发生火灾。其《与杨京兆凭书》记载了永州的火灾及自己深受其害的状况“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坏墙穴牖,仅免燔灼。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逐毕方文》序中所记乃元和年间夏天永州之火灾,“日夜数十发,少尚五六发”,以致于人民不得安生。州人相传乃怪鸟作祟,于是柳宗元推其为《山海经》中之怪鸟毕方。《山海经》是先秦古籍,主要记载巴蜀、荆楚一带的事物及很多神话传说故事,属于我国上古时期南方巫文化系统的著作,这也体现了永州人之根源于楚文化的巫思想。《招海贾文》从侧面反映了永州人对经商的痴迷。永州境内山峦重叠,溪河密布,物产丰富,自古以来,楚国就重视商业、尊重商贾,形成了“重商”的传统。但在唐朝,商贾的地位比较低,士人普遍视经商为末业,是以柳宗元的《招海贾文》对海贾为求利而冒险出海经商的现象是颇有异议的。

楚地“信巫鬼,重淫祠”^[13]的风俗由来已久。受楚文化浸润的永州,在唐代时此风依然很盛“永州是一块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的土地。既有舜文化的历史熏陶,又有楚文化的长期浸淫,这种人文的背景形成了永州民俗的崇拜心理。永州又是一片古老闭塞的‘南蛮之地’,自然环境的背景,形成了相信鬼神的习俗。由于文化和自然的双重背景的作用,永州的习俗,有了进步性、合理性与愚昧性的交织混淆的特征”^[14]。柳宗元思想中比较进步的一部分是他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如《时令论》、《断刑论》、《天说》、《永州龙兴寺息壤记》、《非国语》等,批判天人感应说和鬼神迷信思想。然而在永州时,他曾随人祈雨,其辞赋作品中也多次出现“神灵”一类的字眼,这与楚人的多神崇拜习俗有关,日神、水神、火神都是他们崇拜祭祀的对

象。《愚溪对》中的愚溪之神,《憎王孙文》中的“山之灵”,《诉螭文》中的水神等等,都体现了当地神巫风习对柳宗元潜移默化的浸润和影响。

总之,柳宗元的辞赋作品特别是他的以“文”为名的新文赋作品,受永州民风民俗的影响比较大,在接受异域文化影响的同时,柳宗元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及文学创作展示并影响着这片南国土地。

[参考文献]

- [1] 高利华. 异量之美——地域文化研究的永久话题[J]. 社会科学战线, 2007(3): 173-175.
- [2] 周振甫. 文心雕龙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414.
- [3] [唐]柳宗元. 柳宗元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文中柳宗元之文章均引自此书, 不另注.
- [4] 孙昌武. 柳宗元传论[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182.
- [5] 吴正岚. 论屈原与柳宗元的精神契合[J]. 云梦学刊, 1995(4): 10-13.
- [6] 马积高. 赋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313.
- [7] [宋]洪兴祖. 楚辞补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551.
- [8] 刘斯翰. 汉赋——唯美主义之潮[M]. 广州: 广州文化出版社, 1989: 159.
- [9] 田晓岫. 中国民俗学概论[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42.
- [10] 万里. 丰富多彩的湖南民俗[M]//王兴国, 聂荣华. 湖湘文化纵横谈.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0: 326.
- [11] 张正明. 楚文化志[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8: 412.
- [12] 邹容. 几赋[M]//全汉赋. 费振刚, 仇仲谦, 刘南平校释.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6: 43.
- [13] 班固. 汉书·地理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666.
- [14] 夏卫平. 柳宗元的永州意识[J]. 学术论坛, 2005(8): 145-148.

Yongzhou and Liu Zongyuan's Fu Creation

LI Xiao-hua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Most of Liu Zongyuan's Fu works were created on Yongzhou, Hunan province. There was natural landscape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sad implications of cultural traditions in Yongzhou. That gave Liu Zongyuan new visual and spiritual experience and helped his Fu works. Landscape scenery in Yongzhou was vividly demonstrated in Liu Zongyuan's works. QuYuan and Chu culture influenced Liu Zongyuan's creation. Yongzhou's local customs provided materials for his creation. In the fluence of different area culture, Liu Zongyuan's Fu works broke a new path.

Key words: Yongzhou; Liu Zongyuan; Local Culture; Fu